



引用格式: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雷特·克拉克,刘顺.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辩证法[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55-64.

中图分类号:A1;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55-010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辩证法

Marxism and ecological dialectics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¹,布雷特·克拉克²,[翻译]刘顺³
J. B. Foster¹, Brett Clark², [Translator] LIU Shun³

1. 美国俄勒冈大学 社会学系, 美国 俄勒冈州 尤金;
2. 美国犹他大学 社会学系, 美国 犹他州 盐湖;
3. 上海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马克思所提出的囊括人类、自然和社会三重维度的“新陈代谢”这一概念, 饱含着深邃的生态世界观, 是生态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这一世界观是劳动价值论和生态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蕴含着独到的生态辩证法。在一定意义上, 生态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针对当前流行的那些企图淡化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诘难, 有必要利用生态辩证法对其作出有力的回应, 以期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生态辩证法的未来愿景是: 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发展的人类社会, 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可以合理调节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 从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生态辩证法;
资本主义;
新陈代谢理论

收稿日期:2017-05-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7YJC710051);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ZZHS16006);2016年度上海海事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1953—),男,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旗舰人物,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的生态学》《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与《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等;布雷特·克拉克,美国犹他大学副教授;刘顺(1988—),男,河南省鹿邑县人,上海海事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哲学。

[译者导言]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著名左翼美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主编,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领军人物,长期从事资本的生态批判研究和相关约稿组稿工作。本文是作者一贯秉持的“马克思具有深刻的生态世界观”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和总结,作者首先针对马克思生态学研究的一些突破性进展来展开讨论,旨在说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深刻意涵;尔后,作者试图对当前那些流行的、企图淡化新陈代谢理论的观点,进行客观的批判性阐述;最后,作者循序渐进凝练出生态辩证法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核心地位。本文不但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生态世界观作了进一步阐发,而且在全球性生态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控制的今天,自觉为马克思思想的“在场性”提供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合理辩护。

一、问题的提出

那种认为“生态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思想基础”(这可在马克思的“生态代谢断裂理论”中得到印证)观念的复兴,正在重新定义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即站在新的角度去界定资本批判与自然科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秉持“马克思思想只是德国理想主义、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与英国政治经济学相互杂糅而形成的一种粗鄙复合体”观点的人来说,这种复兴似乎令人吃惊。然而,曾在20世纪盛行的古典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正在被一种更加广泛的共识所替代,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密不可分。个中缘由就在于,他的理论不但关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还涵盖其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革命的批判。

在乔治·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根植于其把劳动观念作为社会—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中介。在这种意义上,人

类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的和自然生态的。而且,任何一种对现实的历史的理解,必须聚焦到人类自然条件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上。^[1]正是基于这种总体性的综合方法论,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认识到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的重要性,以及触达人类自由和实现人类潜力最大发展的必要性。因此,社会主义要求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去合理调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可以说,马克思提出的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社会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断裂这些核心概念,事实上已逐步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批判性的生态世界观。^{[2]949}

马克思的这一方法论与其生态价值论存在着紧密关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批判的核心,是剖析代表着总体生产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是抽象劳动的结晶)之间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极力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资源被当作一件“自然馈赠给资本的免费礼物”,所以它们不直接参与价值的生产。^[3]基于此,他把财富与商品价值区分开来,认为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被自然界和劳动共同生产出来。与此截然相反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价值/交换价值的源泉是对人类劳动力的剥削。这样,财富与价值的矛盾就成为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并与自然生态条件退化和破坏直接相关。正是资本主义价值与积累过程之间的这种生态矛盾,恰能解释走向生态危机或新陈代谢断裂的资本主义制度趋势。这种制度对利润的狭隘追求(且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正日益破坏支配着一切生命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社会再生产过程。

对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和生态价值论的“重新发现”及其在分析生态危机中的作用,已经出现明显“不和谐”的趋势^[4]。一些左翼学者试图盗用马克思的社会新陈代谢理论,宣扬原始社会的“一元论”观点,而其理论基石正是诸如社会的“自然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独特新

陈代谢”概念。^{[5]80-81} 这些观点,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它们从根本上是唯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超社会建构主义概念,它们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并倾向于淡化一切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甚至根本不把生态危机当作世界末日或者重大灾难来看待。因为他们认为,生态危机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法则。在部分左翼学者看来,面对地球灾难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例外论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存在着持续性关联。^{[5]169-192}

接下来,我们将针对马克思生态学的一些主要突破性研究进展展开简要讨论,这主要结合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和生态危机因果关系来探讨,并通过研究其新陈代谢理论的概念结构来实现。之后,我们将对当前那些流行的、企图淡化马克思“独到的新陈代谢理论”(体现着市场内部逻辑)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综述。^{[6]10-19}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和总结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

二、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概念框架

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具有鲜明的复杂性,不妨用 I. 梅扎罗斯提出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框架来作参照理解,因为异化理论是构成马克思所有思想的基础。在梅扎罗斯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呈现出“人类—劳动/生产—自然界”的三角关系。人类必然通过劳动生产来调节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然而,资产阶级社会利用商品交换制造出一套整体的二阶调整关系,这就导致出现一个更加异化的三角关系:异化的人类——异化的劳动和生产——异化的自然界,而异化的自然界叠加在前两者之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在第二个异化的三角形,它却无视异化的概念而认为劳动和生产具有直接性;但在梅扎罗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科学,主要聚焦于(异化的)自然界与

(异化的)生产之间的关系,目的就在于彻底主宰自然界。正因如此,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的异化作用才得以凸显出来。梅扎罗斯写道:“对于包括污染在内的严峻的‘自然异化’现象,若不能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在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后果是难以予料的。”^{[7]99-114}

同样的概念性框架,尽管被视作充满生态学意义,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展现得更加突出,即在马克思对全球自然代谢、社会代谢与新陈代谢断裂的研究分析中体现出来。在他看来,劳动—生产过程应该被看作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因此,蕴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关于新陈代谢的一些概念框架术语,可表征为非异化的三角关系(人类—社会新陈代谢—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新陈代谢就是实际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人类(经由劳动)与整个自然界即全球的新陈代谢进行物质变换的重要中介,虽然具体的历史形式和发生过程都存在着特定的差别。

随着与商品生产相关的二阶调节关系(土地的减少与劳动向商品的转化)的出现,在基本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存在着叠加,表现为一个异化的三角关系:人类异化—社会新陈代谢的相互依赖的过程的异化(新陈代谢断裂)—自然的全球新陈代谢异化。^{[2]949} 因此,正如青年马克思在《对詹姆斯·米尔的政治经济学元素的评论》中,把新陈代谢断裂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物种活动“异化的调节”。^[8]

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观日益推崇生态现代化模式,因为它不得不解决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社会新陈代谢的断裂。所谓的技术解决方案,诸如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等,通常被他们建议和采用,但事实上都没有触及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在资本主义仅仅把生态矛盾移来移去的背景下,最终自然界的普遍性新陈代谢断裂就会更加严峻,其影响远超过

直接的生产过程,并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绝对极限”问题。这种理论框架恰好构成马克思生态危机理论的核心,其特别强调由生产制度肇始的人类新陈代谢断裂。在广度和深度上出现的日益严峻的生态挑战和生态灾难之结果,正代表着资本主义体系市场制度的最终失败。

这种整体的概念性框架在马克思有关19世纪土壤危机的讨论中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他以此为背景引入了“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人类在整个文明史上一直从事农业,呈现出人类—农业—土壤的三角关系。人类文明史上充斥着很多转向非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农业例子,它们导致了土壤退化。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化和农业的发展,新的商品关系随之出现,以定性的新方式破坏了这种恒定的自然关系,因为必要的营养物质(如氮、磷、钾)不能反馈给土壤,所以出现了农业生产中更加广泛的、严峻的生态代谢断裂。这是一种“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无可修复的断裂,而这种新陈代谢是由生命自身的自然法则所规定的”^{[2]949}。

为了解决支配着土壤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的中断问题——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城乡之间极端对立的产物,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开始着手研究解决新陈代谢断裂的办法,这一方面带来国际鸟类和硝酸盐贸易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带来化肥工业的发展。鸟类和硝酸盐贸易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并肇始帝国统治战争的爆发。^[9] 工业化肥的发展,尽管有助于创造用于战争的化学品,同时也愈加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载体。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显然忽视了造成异化自然和异化社会的深层制度根源,反而导致巨量化肥的流失、水道退化以及世界海洋死亡带的出现。因此,在全球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化学化肥,驱使人类社会和土壤的新陈代谢断裂向自然界中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新陈代谢断裂扩散,逾越了全球的生态边界,并破坏了生物圈的基本生物的地

球化学过程。^{[10]73-87}

倘若放到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中,所有的这一切都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体系的理论诠释中(以及在普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而一般情况下使用价值离不开与生产活动相关的自然物质基础。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来源于抽象劳动)仅仅源自于对劳动力的剥削,而缺乏任何自然物质基础层面上的考量。因此,自然界被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免费馈赠给资本的礼物”。这种生态矛盾就产生了所谓的“劳德代尔悖论”。该悖论以劳德代尔堡的第八个伯爵詹姆斯·梅特兰的名字来命名,他是19世纪初的一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劳德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私有财富(交换价值)的积累,一般取决于对公共财富(使用价值)的破坏式开发,从而生成稀缺和垄断,以满足积累过程的实现。^{[10]53-72} 在这些条件下,耗损公共利益的、加剧的环境退化正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固有后果,甚至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基础,因为一些新兴产业诸如废物处理产业,正是为了应对所谓的环境影响而出现的。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极端的消耗制度,这种制度在利用自然力量(包括被马克思称为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量”)时是贪婪的。在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动机驱动下,资本主义促使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最大化,然后把所产生的废弃物倾倒入环境之中。“‘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是每个资本主义者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11]380-381}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的特色就在于,它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的退化与破坏,已被其商品生产制度所强化,而这种商品生产制度是以对劳动力的纯粹计算为价值法则的,但同时又把自然界视作一种无价值的领域。

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的概念及其与社会和生态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最初

来源于他的朋友、革命同志和社会主义医生罗兰特·丹尼尔斯著作的启发。丹尼尔期在1851年的著作《小宇宙》中,运用流行的系统理论中新陈代谢概念来诠释植物与动物之间的交互关系。^[12]马克思在丹尼尔斯思想以及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著作的基础上,建构并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和新陈代谢断裂理论。^[13]在撰写《资本论》及随后的时期内,马克思愈来愈注意到生态危机。在阅读了植物学家卡尔·弗拉斯关于历经“类文明”长期历史中出现的土壤破坏和荒漠化的研究之后,他认为这个过程在很多方面仅仅强化和扩展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使在异化劳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现代制度变得“无可救药”。基于此,马克思推断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破坏代表着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主义趋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需要对这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性的瓦解。^[14]

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新陈代谢的概念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新陈代谢断裂的事实,主张在面临资本主义退化的境遇下去“激活”一种非异化的社会新陈代谢,并推动一种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这些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对作为一种剥削劳动力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反,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最初源泉即土地和工人”^{[11]638}。

三、生态和社会一元论:自然界被统摄

马克思社会新陈代谢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较早引入并使用现代生态系统和地球系统概念(二者均源自于新陈代谢理论),并且在社会生态学内部,使这二者在形成期有着清晰的内在联系。^[15]马克思的总体唯物主义方法论率先使用了若干生态学概念,并在一些方面促进了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生物学的巨大进步。而且,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与他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着紧密联系,仍是最成熟的辩证法理论,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可用它来理解资本主义在何种程度上造成了劳动和自然界的退化。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持左派传统思想的理论家,却试图采取另一种路径,推崇生态学维度上资本主义的统摄作用,诸如资本主义应该被视为生命之网本身的组成部分。这种社会一元论显然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攻击。其明显意图是,欲割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关系。

许多秉持社会一元论的观点,携带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固有的断然拒斥自然辩证法的认识论根源,这种认识肇始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本到处自相矛盾和后来完全被他自己否定的著作)一书中的一个著名注脚,即他在这里质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16]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探险》到其他很多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发表,蕴含在其中的拒斥自然辩证法及“自然界仅仅是分析和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客体”的观点,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并成为他们的哲学传统。这就强化了一种仅仅局限于人类、人类世界和人类历史科学的唯心主义主客体辩证法。^[17]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第一自然”(人类社会之前的自然)已经被“第二自然”(被人类社会改造后的自然)完全瓦解。^{[18]65-69}因此,自然界已不再作为一种现实和本体论存在,在社会建构的“混合体”中,自然界仅仅是一种虚无存在。^{[6]15}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冲突,也不承认新陈代谢断裂的出现以及作为笛卡尔“二元论”载体的自然界的异化。^{[5]4,19-20,78,152}任何一种持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然破坏基本的

生态过程的观点,就被标签化为“世界末日论”,被视作对自然科学家和激进生态学家的指责,并当作社会一元论世界观的主要敌人。

秉持严谨的批判性视角就会发现,社会一元论观点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深层矛盾,包括那种把社会决定论引申到“自然界消亡”的观点也是如此。譬如,乔治·摩尔反对将自然与社会相分隔的“二元论”,其理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一元论的关系视图”,在这里自然和社会的“融合捆绑”意味着二者的统一存在。^{[5]385}他认为“资本主义不管在多大程度上调和与生态圈的关系”,然而资本的力量构建和培植了“生物圈的资本主义过程化”。抑或,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资本主义从整体上内化了自然界的矛盾,但是‘生命之网’却内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6]12}。在任何时候,自然界仅成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要素,实际上就消解了自身的存在。

这些理论家最大的恐惧就是二元论。左翼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和埃里克·斯温德杜夫甚至声称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位二元论者。史密斯断言:“考虑到马克思本人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在他的理论视域中同样存在着自然界概念二元论的影子,事实就是如此。”斯温德杜夫写道:“社会和自然,或许已被马克思融合为一体,二者成为了历史的、地理的存在,但是他又把二者作为先验存在的独立领域。”^{[20]446}为了克服他所说的马克思的“社会—自然二元论”,斯温德杜夫以独特的“社会自然”形式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杂交主义。

由此产生的荒谬现象,便体现在摩尔所推崇的重要地理学家布鲁斯·布劳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埃尔马·阿尔特瓦特的批判指责中,因为后者依据物理学理论坚持在他的研究中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21]显然,摩尔违反了自然科学:“‘熵法则’在能量和生产的特定形式下发挥作用。它并不是由抽象的生物

圈来决定的。从历史性自然的角度来说,熵是可逆的和具有周期性的,但是在特定文明的逻辑内,要受制于上升的熵。”^[22]然而,怪诞的社会一元论观点认为,熵要听从社会的安排,因为人类社会能够逆转和回收熵,从而能够回转或弯曲“时间箭头”。

这些左翼思想家甚至还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认为“自然界及其衍生物‘环境’和‘可持续性’,是‘空’的符号”^{[23]304}。尽管“作为历史产品的自然界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但是社会关系却生产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20]446}。在这种本质上反环保主义的视域下,受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术语的影响,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包括整个绿色运动组织在内)被批评不应该持有“自然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冲突”的观点,且被说成倾向于“虚幻的想象”,滋生了“生态恐惧”,即认为“为了避免内在的灾难,有必要对资本主义这种阴云密布的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23]308-309}。史密斯斥责了那些气候科学家,因为他们“试图区分社会(人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认知不但是“一个愚人的辩论,而且是一个愚人的哲学: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留下了巨大的鸿沟,即自然界在一个角落,社会在彼此分开的另一个角落”^{[18]244}。

史密斯和其他左翼思想家针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和行动所持的整体怀疑主义态度,实质上表现出对现状的默认和对环境议题的疏离。摩尔把他所说的“绿色唯物主义(他所使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术语)的新陈代谢崇拜”,归因于地球系统的“生物物理”概念。不仅史温吉道甚至阿兰·巴迪欧和斯拉沃热·齐泽克都认为,“生态已成为群众的‘新鸦片’”,而且这个论断被他们一再逐字强调。^{[5]15}

在回避生态科学的时候,摩尔警告说不要形成“对自然极限的盲目迷恋”^{[5]80}。与一些世界主流的气候科学家的观点相反,作为人类世

(荷兰气象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的概念,指地球的最近代历史)工作小组的成员,他断言,“人类(人类社会)并不能去统治自然力”。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显然具有无尽的能量,“突破看似不可逾越的‘自然极限’”,因此,在与人类世相关联的星球界限中,并没有真正的代谢断裂,这就意味着“没有理由去担心”^[24]。最糟糕的是,这种制度(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滥用,最终必然造成自然资源成本的增加,这就为资本带来了底线问题,原因就在于“廉价自然”愈加难以觅到。^{[5]112-113}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被视为一种“世界生态学”,它在“生命之网中得以展开”,无论何时何地,它都有能力不断克服经济稀缺。^{[6]16-17}

摩尔欲采用“生命之网”这个术语来表明他正在重视的生态问题。然而,这个短语主要被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对自然具有包容性”的一个隐喻。无论是在自然还是在社会意义上,世界从整体上被简单描述为一种相互联结或勾连的关系集合,在该集合中,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摩尔的这种理论立场在很多方面与坚持生态现代化战略和“绿色资本主义”的学者相似,认为通过把自然内化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就能够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即把一切都纳入到市场逻辑中去。^[25]

这种分析拒绝接受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和社会新陈代谢断裂之类的质疑,试图调和异化的人类与异化的自然之间的矛盾,并使现存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摩尔无视马克思有关“社会新陈代谢相互依赖过程中的断裂”思想的复杂认知,反而把这称为“能量的单一代谢”^{[5]83}。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新陈代谢断裂,而在于新陈代谢转移,……新陈代谢成为识别转移(临时的和具体情况的)而非断裂(累计分离)的一种途径”^{[5]83-84}。与史密斯的“资本主义驱使自然界的统一性”相一致,摩尔完全否认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自然之

间的社会新陈代谢被“异化调节”的理论。^{[18]81}

在社会一元论思想家的单维视角中,研究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相互渗透、交互和调节是毫无道理的,自然循环过程不被认为是相对独立于社会的,甚至认为通过抽象力仍然被归入社会内部,因此,自然界不再被视作合法的研究主体。在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的复杂辩证法里,我们只剩下一种“辩证的混合体”,在这个混合体中,现实被社会化地建构为一系列物质或过程的集合体^{[5]13,37,76,78}。对于摩尔来说,世界生态的概念仅仅意味着大写的资本被镌刻在一切事物之上,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之网”,只不过是一堆商品的集合。于是,地球系统的概念就被轻描淡写地消解了。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马克思明确认为,自然与社会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彼此不能也不应该被归入到对方那里。这并非意味着要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作出选择。相反,作为一种开放理论体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提供了唯一有意义的可用来研究分析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聚焦于调节手段、总体性,以及兼顾到现实和综合层次的异质性特征。^{[1]119-124}此外,这不可能仅仅通过苦思冥想来实现,而应在源自真实的物质关系下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四、辩证实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统一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深切关注着如何解决自然的异化问题。他写道:它“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26]。

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社会新陈代谢和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框架,恰好为解

决这种分离提供了办法。这种理论框架作为一种开放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能够解释内部与外部的相互关系,阐明自然的异化与新陈代谢断裂甚至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断裂的出现如何与资本制度相互交织耦合。

社会新陈代谢涵盖人类劳动和在更大范围内与生物物理世界相关的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与自然之间一种必要的“新陈代谢交互”^{[11]637-638}。在他之后,卢卡奇解释说,劳动“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因为这些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并且是不可逾越的先决条件”^{[27]44}。他注意到,“不管劳动过程发挥出多大的变革效果……自然边界只能后退,但绝不可能消失”^{[11]34}。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生命自身和社会得以存续的永恒条件,“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1]284}。

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与商品生产的具体形式和无止境的追求资本积累相关的且特点鲜明的二阶调节。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不仅异化了人类和生产过程,而且也异化了自然界自身。如前所述,对此人们采取了一些异化调节的措施,但造成了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因此,生态危机在社会新陈代谢的交互过程中显现的断裂,抑或只有通过辩证批判实在论才能得到彻底解决。^{[2]949-950}

人类只要积极参与劳动和生产,就处于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也即获得了“第二自然”的存在形式。然而,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在更广泛、动态和普遍意义上仍然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全面兼顾到内部和外部关系,而不是把分析仅仅局限于内在动力。这就引出了开放辩证法与封闭辩证法之间存在区别的关键性问题。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这个辩证法的概念(在定冠词意义

上)——作为哲学意义上或者的确作为唯一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很明显把你置于这种位置:辩证法适用于一切……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许能被划归为维多利亚时代,即体现新科学的‘真理即成事实’精神;我们只能理解我们所做的,因此我们只认识历史而非自然界本身,因为后者正是上帝所负责的东西。”^[28]

相比之下,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质上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它拒斥封闭:不存在完全脱离自然的人类领域,当然也没有上帝的领域。从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甚至强调环境的动力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拒绝接受自然的辩证法。卢卡奇在其《社会存在本体论》“马克思”这一章中(后来以英语独立出版),试图重新整合马克思的思想,他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辩证认识论只具有近似的理论特征,这是因为现实包括物质复合体的持续相互作用,该复合体位居内在和外在的异质性关系中,并且它们自身是通常异质性成分的动态合成体,以至于有效元素的数量是可以无限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知识的近似特征并不主要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尽管它也会去影响认识论;相反,它是对知识本体论的反思;客观因素的无穷和异质性以及这种形式的主要结果即科学法则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作为一种倾向来实现自己,必要性也只有在与反对力量的纠缠中才能得以确证,也只有通过无数事件所发生的调节关系来实现自我。”^{[27]103} 这表明:为了拒绝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和“替代束”概念,“双重内在性”和资本主义设想的自然界统一,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退回到前黑格尔时期的唯心主义,这是一种类似于莱布尼茨体系的投机哲学,坚持着“无窗”的单子论思想和静态的“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理论。^{[5]1}最近流行的社会一元论和混合主义概念把此作为拜物教迅速登场的基础,并被用于重新考量社会理论,以期实现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就带来了阿尔弗雷德

北·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性的谬误”之瑕疵。^[29]

对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娜欧蜜·克莱恩客观地指出,“地球吸纳全球资本主义贪婪的新陈代谢污秽副产品的能力,正在遭遇透支”^[30]。资本主义的强大破坏力,正在驱使大气中温室气体的逐步积累,这种积累与其他因素造成地球系统中新陈代谢的人为断裂,这远远超出直接的社会生产所造成的生态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正在造成海洋酸化,它对海洋钙化产生巨大影响,而海洋钙又需要使用更多的能量才能生成,以用于地壳和板块的形成。^[31]物种是广泛生物网的基础,因此一旦它们受到刺激,就会在生物圈规模上产生大范围的影响。此外,海洋变暖和酸化正在导致珊瑚漂白化和坍塌。这些发达的珊瑚生态系统,在生成营养丰富的海洋环境与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32]海洋酸化被认为是以前生物大规模灭绝的驱动因素和当前生物大规模灭绝的一个肇因。

基于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概念框架,就成为理解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地球系统新陈代谢断裂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尽管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技术修复手段来应对这些生态断裂,但是所有这些都将导致自然界新陈代谢范围内积累的结构危机,因为构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东西并未消失。^[33]马克思警告说,人类历史可能被破坏生命基础的一种异化的新陈代谢所摧毁和阉割。^[34]考虑到英国殖民主义正在导致爱尔兰新陈代谢断裂的极端案例,他认为在这些可怕的条件,“毁灭或革命就是标语”^[35]。

在马克思对资本和异化的新陈代谢批判中,隐含着新陈代谢恢复的肯定性认知,即运行在“人类存在的永恒自然条件”之中的非异化的社会新陈代谢。^{[2]959}要实现新陈代谢恢复,需要阻止“私有财产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对立”,根

除资本统治制度的异化。^{[7]113}这种以唯物主义为底色的理论,有助于促进一种复杂的动力学分析观点的形成,明确生产活动如何在更大范围内的生物物理世界中被引导和治理。正如批判现实主义者罗伊·巴斯卡尔所认为的:“仅仅在第二自然遵循第一自然所施加的必要约束时,我们人类才能作为一种生物而存在。尽管第一自然总是被历史地调节,但是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逃脱它。”^[36]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强调,“自由不在于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事实上,“真正的人的自由”需要“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37]。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法及其价值论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构筑一个可持续的、共同进化的生态愿景,据此,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物质变换),以推动人类未来的不断进步。这也正是马克思本人最深刻的、最具革命性意蕴的社会主义构想。

参考文献:

- [1] LUKÁCS Georg. *Labour* [M]. London: Merlin, 1980.
- [2] MARX Karl. *Capital*: vol. 3 [M]. London: Penguin, 1981.
- [3] MARX Karl, ENGELS Frederick. *Collected works*: vol. 3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732 - 733.
- [4] FOSTER J B. *Marxism in the anthropocene: dialectical rifts on the left* [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6 (3): 393.
- [5] MOORE J W.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M]. London: Verso, 2015.
- [6] MOORE J W. *Toward a singular metabolism* [M] // Ibañ D, KATSIKIS N. *Grounding Metabo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7] MÉSZÁROS Istvá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M]. London: Merlin, 1975.

- [8] MARX Karl. Early writings [M]. London: Penguin, 1974: 261.
- [9] HORNBOG A, CLARK B, HERMELE K, et al. Ecology and power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68 – 82.
- [10] FOSTER J B, CLARK B, YORK R. The ecological rift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 [11] MARX Karl. Capital: vol. 1 [M]. London: Penguin, 1976.
- [12] DANIELS Rolang. Mikrokosmos [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88.
- [13]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 [14] MARX Karl, ENGELS Frederick. Collected works: vol. 42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7: 558 – 559.
- [15] FOSTER J B. Marxism and ecology [J]. Monthly Review, 2015(7): 2.
- [16] LUKÁCS Geor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M]. London: Merlin, 1968: 24.
- [17] BOTTOMORE Tom.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M]. Oxford: Blackwell, 1983: 523 – 26.
- [18] SMITH Neil. Uneven development [M].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65 – 69.
- [19] MACLEAN G K. Bertrand Russell's bundle theory of particulars [M]. London: Bloomsbury, 2014.
- [20] SWYNGEDOUW Erik. Modernity and hybridity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9 (3).
- [21] ANGUS Ian, MURPHY Fred. Two views on Marxist ecology and Jason W Moore [EB/OL]. (2016 – 06 – 23) [2017 – 03 – 20].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
- [22] MOORE J W. Nature in the limits to capital [J]. Radical Philosophy, 2015 (193): 14.
- [23] CHRIS M W.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planning theory: conceptual challenges for spatial planning [J]. Regional Studies, 2011(2): 277.
- [24] ANGUS Ian.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 [25] HAWKEN P, LOVINS A B, LOVINS H L. Natural capitalism [M]. London: Earthscan, 2010.
- [26] MARX Karl. Grundrisse [M]. New York: Penguin, 1973: 489.
- [27] LUKÁCS Georg. Marx [M]. London: Merlin, 1978.
- [28] JAMESON Fredric.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M]. London: Verso, 2009: 3 – 7.
- [29] WHITEHEAD A N.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25: 51.
- [30] KLEIN Naomi.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4: 177.
- [31] BEDNARŠEK N. Limacina helicina shell dissolution as an indicator of declining habitat suitability owing to ocean acidification in the California current ecosystem [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4 (4): 1785.
- [32] EDINGER E N. Reef degradation and coral bio-diversity in Indonesia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998 (8): 617.
- [33] MÉSZÁROS Istvá.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politics [J]. Monthly Review, 2006 (4): 34.
- [34] MARX Karl.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3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309.
- [35] MARX Karl, ENGELS Frederick. 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142.
- [36] BHASKER Roy.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M]. London: Verso, 1986: 222.
- [37] ENGELS Frederick. Anti-Dühring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136 – 138.